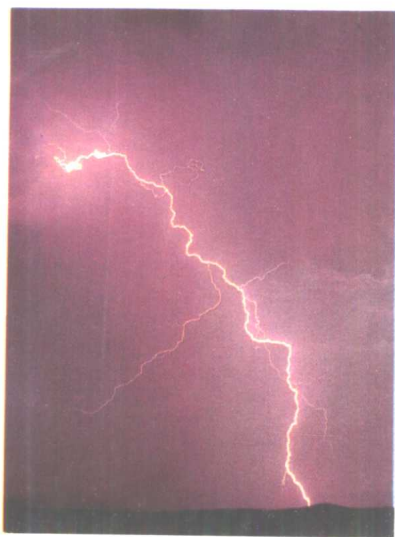


办《光明日报》

十年自述

一九五七——一九六七



“双百”方针的初步贯彻和严重挫折
“文革”初期上层的斗争情景

.....

穆欣著

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

(1957—1967)

穆 欣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北京

(京)新登字 071 号

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

穆欣著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甲 10 号

电话:(01)2581570 传真:(01)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春雷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5 印张 320 千字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023-747-8/K·695

定 价:8.90 元



作者在工作中

(1961年12月30日在光明日报编辑部)

目 录

一 到《光明日报》工作.....	1
(一) 意外的风波.....	1
(二) 撰写《邹韬奋》及其他.....	6
(三) 储安平把报纸引向邪路.....	9
(四) 新的编辑方针.....	19
(五) 突出报纸特点.....	25
二 推动百家争鸣的尝试——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	32
(一) 选择曹操评价问题作突破口.....	32
(二) 争论的几个热点.....	35
(三) 毛泽东说：“这个案要翻！”.....	40
(四) 一个小小的插曲.....	42
(五) 一场不应发生的风波.....	44
(六) 一次良好的开端.....	47
三 一场导向错误的论战——《新人口论》批判始末.....	52
(一) 对马寅初人口理论的围攻.....	52
(二) 双方争论的几个方面.....	56
(三) 康生插手使批判升级.....	61
(四) 历史的教训应当铭记.....	66
四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遗传学在争鸣中前进.....	71

(一) 遗传学界的分歧和争辩	71
(二) 取长补短,消除门户之见	74
(三) “百家争鸣复兴了遗传学”	78
五 心理学论战的三个回合	84
(一) 1958:批判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	84
(二) 1959: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91
(三) 1961:关于学科性质的争鸣	94
六 “拔白旗”到“神仙会”	99
(一) 整风交心和自我改造“大跃进”	100
(二) “拔白旗”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	107
(三) “神仙会”是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	112
七 曲折发展的教育革命	118
(一) “实际上把教育搞乱了”	118
(二) 要作冷静的促进派	127
(三) 难以忘怀的关注和指点	133
八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	143
(一) 书法史上的千年疑案	143
(二) “争论是应该有的”	144
(三) 报刊背后的议论	151
(四) 争鸣才能促进学术发展	157
九 专刊和副刊	158
(一) 构成《光明日报》一大特色	158
(二) 毛泽东说:我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专刊	163

(三)	综合性的《东风》副刊·····	172
(四)	副刊也得到毛泽东的关注·····	183
十	文艺界的波涛·····	188
(一)	戏曲和音乐舞蹈改革的讨论·····	189
(二)	《李慧娘》的冤案·····	197
(三)	京剧现代戏会演的风波·····	203
(四)	关于“时代精神”的争鸣·····	211
十一	“合二而一”批判的真相·····	220
(一)	艾、林文章见报和康生强加控制的经过·····	220
(二)	从学术讨论到政治批判的发展过程·····	224
(三)	澄清若干事实的误传·····	229
(四)	经验与教训·····	234
十二	史学领域的风风雨雨·····	239
(一)	两次“史学革命”·····	239
(二)	围绕李秀成评价的论战·····	245
(三)	关于“让步政策”的争论·····	251
(四)	“学术讨论”升级为“政治批判”·····	256
十三	山雨欲来风满楼：浩劫序幕·····	262
(一)	密室策划，姚文元点火·····	262
(二)	学术界的震惊和愤慨·····	268
(三)	逐步升级的政治阴谋·····	272
(四)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276
十四	黑云压城城欲摧：浩劫伊始·····	286
(一)	在迷惘与惶惑中跟着走·····	286

(二) 在“工作组”设废问题上的斗争·····	299
(三) 两个阴谋家的勾心斗角·····	306
(四) 周恩来力挽狂澜·····	316
(五) 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江青·····	330
十五 万里蛮烟瘴雨,往事莫惊猜·····	343
(一) 在错误舆论导向下办报·····	343
(二) 两次被绑架·····	357
(三) 秦城监狱 6813 号“犯人”·····	370
后 记·····	392

一 到《光明日报》工作

(一) 意外的风波

1956年春天,党组织决定调我到光明日报社工作。我是从哈尔滨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调来北京的,从此离开了曾经长期工作过的部队。抗日战争初期我曾参加山西新军做政治工作,1938年夏天调往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同年6月开始在根据地办报。直到1946年夏天,正当解放战争的帷幕刚刚拉开的时候,调任新华社总社特派员到前线采访,重新穿上戎装。从这年冬季晋西南地区吕梁战役开始到陈赓将军的部队工作,其后这支部队的番号变过多次:太岳纵队——第四纵队——陈谢兵团——第四兵团——抗美援朝志愿军第三兵团,自己始终跟随这支攻无不克的英雄部队行动。1952年从朝鲜战场回国,翌年春起又到军事工程学院工作3年,前后在部队里度过10个春秋。不论在解放战争前线,还是在朝鲜战场上,革命部队气吞山河、同仇敌忾的战斗豪情,革命战士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都给自己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并使自己受到莫大的激励和鼓舞。我对部队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也不忍放弃自己矢志于新闻事业的意念。所以得知这次调往报社工作的信息,感到高兴。自己过去较长时间都在通讯社作军事记者,比较熟悉采访业务。如今转往报社改习报纸编辑业务,虽知一旦投入会有不少困难,思想上还是乐于一搏的。

这年3、4月间,我就为调动工作的事来到北京。办理调动工作

手续要经过军委总政治部，不料有的同志加以劝阻，意欲要我留在部队办报或编刊物。我因决心已定，只好恳请放行。多亏陈赓和张际春同志等帮忙疏通，终于得以解决。当时自己住的军事工程学院驻京联络站在西城区灵境胡同，就在陈赓住宅的前院。这里距光明日报社旧址石驸马大街（今已改称新文化街）不远，距离其时还在中南海内办公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住地更近。报社有些熟悉的同志常来看我，交谈有关这个报社的情况，有时还带来一些报社编印的业务资料；又经中宣部有的同志介绍，渐对这个报纸有了一点粗略的了解。

《光明日报》和自己曾长期工作过的在党直接领导下的新闻单位都不相同，当时它是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主办的报纸。这张报纸原是中国开国前夕，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办，于1949年6月16日在北平创刊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创刊之前，民盟中央总部于6月6日通过的《光明日报组织大纲》，明确了这张报纸是中国民主同盟经营的言论出版机关，其性质是国营的文化企业单位。它的宗旨是进行宣传、教育、团结各革命阶层人士，以求贯彻并完成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自1953年起，改为由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致公党（致公）、九三学社（九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全国工商联）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主办的报纸。由各民主党派宣传部长与报社社长、总编辑，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的顾问组成社务委员会，实行社长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报纸的性质和任务也在这时作了调整：明确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编辑方针除报道各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者的思想工作外，以文化教育宣传为重点。1954年又对编辑方针做了局部调整，除继续着重文化教育宣传外，要求逐步加强国际问题的宣传。这张报纸创刊以来，社长一直由章伯钧担任（他

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和农工民主党主席), 历届总编辑胡愈之、邵宗汉、常芝青都是共产党员。但在最初四五年间, 报社内部的中共党员和党组织的活动一直是不公开的。1954年调进一批共产党员来报社任职, 10月间成立中共光明日报社党组, 同时公开党的基层组织(支部和总支部)的活动, 加强了党的领导, 人员配备和报纸面貌都有较大改变。1955年1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光明日报工作的问题和关于协助光明日报和大公报在各地的通讯工作的问题的通知》, 对光明日报编辑方针作了局部改变, 确定仍以报道文化教育作为重点, 但是学校教育方面着重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 并加强科学、文化艺术、卫生和体育活动的宣传和报道; 逐步加强国家机关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宣传和报道; 继续办好各种专刊, 同时继续进行关于各民主党派活动的报道, 并注意加强国际问题的宣传报道。上述情况说明, 党对这个报纸的领导正在逐步加强, 报社党员干部数量也在逐步增多, 虽然它仍有别于党所直接领导的党报和通讯社。

在革命队伍里调动工作本是常事, 过去在根据地或在部队内部, 调令一到背起被包就走。不料这次调离部队时却遇到了一点小小的波折; 没想到到达报社又有一场意外的风波。这场风波是因为这个报纸不同于党报的特点才会发生的。这年5、6月间, 当我携带家小从哈尔滨来到光明日报社的时候, 只在报社“后院”住了很短一段时间, 并未上班即又离开。过了一年多后, 才又接到党组织的通知, 重进光明日报社工作。

当时所以发生这场波折, 原因是在办理调动手续这段时间里, 国内外的大气候有急骤的变化, 直接影响到这个报纸的小气候。

1956年2月, 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极大震撼。美国搞到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抢先发表, 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狂潮, 在人民群众中出现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 给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困难。

这一年，我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在谈到和非党的关系方面，提出“两个万岁”的思想。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要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这就是后来概括的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论十大关系》和“双百”方针的提出，受到党内外的高度重视和欢迎，特别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双百”方针更使科学文化界人士受到鼓舞，思想界日趋活跃。

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听过毛泽东的讲话，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作出反应。他说：“自从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后，我就根据我的主观愿望，加以曲解，特别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他在这时极力美化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鼓吹“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政治主张。（后来又提出“两院制”和建立“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作为实现这种结合的体制。）伸手向共产党要权，认为共产党的帮助是对民主党派的干涉。他在这时一反过去的消极态度，野心勃勃，准备大显身手。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在强调领导核心和强调组织大发展的同时，特别重视舆论宣传，掌握舆论工具：一面积极筹备恢复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办的《中华论坛》杂志，同时着手“改进”光明日报的工作。

章伯钧过去对《光明日报》兴趣不大，很少过问报社的事。这时突然变得格外积极，主动提出“改进报纸”问题。为了确定“改进报纸总方针”，他在5月22日邀请首都各界知名人士举行“改进光明日报座谈会”。7月14日，他又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宣传部长座谈“改进报纸”问题；18日，还到报社召集编辑人员座谈“改进报纸”问题。章伯钧说：“光明日报过去也是为民主党派服务的，在那个时候说，光明日报所做的也可以了。说实在的，当时民主党派向光明日报提出的要求也不顶多。因为当时各民主党派对自己的发展就估计不足，因此对光明日报的发展也是估计不足，具体表现在对社务会议都不积极，参加的人不积极，召集的人也不积极。今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两个万岁’以后，情况大大改变，各民主党派对党派的发展，思想上比较有了一致的认识，特别是听到李维汉部长在人代会的报告以后，大家更加振奋。各民主党派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改进光明日报的问题就是在这一新形势下提出的。”

在有关改进报纸的方针问题上，章伯钧这时讲的还不离谱。他说，作为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政治性报纸，是为人民服务的报纸，而不是一般性的政治报纸。“一切政策方针是受共产党领导，这是肯定的。民主党派本身也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还说：“中国各民主党派的任务，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光明日报的总方针就是宣传社会主义，决不是宣传别的。”

章伯钧说：“关于改进报纸的过渡时间，我看得拉长一点，估计要到今年底才能完成准备工作。在过渡中，希望大家想办法，逐步改变，积累经验，为光明日报的改进创造条件。要求突变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采取的是渐变。”

在这里，章伯钧所以说要把“改进报纸过渡时间”拉长一点，说明他对改组这张报纸的准备工作还未做完。主要是在政治上他还需要再看一看，等看准了再说。而他所说的为改进“创造条件”，当然是指新的编辑方针的制定和对领导班子的改组，将总编辑职务由共产党员“过渡”给民主党派成员。

这个时候，党已决定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并已着手帮助他们从民主人士中物色能够主持光明日报编辑工作的人。因此，当党组织得知章伯钧对我调进报社的事表示不欢迎的时候，便告诉我不要到报社上班，等待另行分配工作。不久，中央决定原在报社工作的党员主要负责人也都调离光明日报，另行分配工作。

（二） 撰写《邹韬奋》及其它

这年8月，组织上决定“另行分配”我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任新闻教研室主任。当时党校新闻班正轮训各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副总编辑一级的负责干部，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还没有开设新闻业务课程。新闻班学员住在颐和园校本部北院上课，新闻教研室则在距离较远的车道沟，和党校所属的短期训练班住在一起，这里称作党校第二部。新闻教研室共有十几个人，正在全力编写《中国报刊史》讲稿，为正式开设新闻业务课作准备。教研室的同志与新闻班保持联系，常去北院与学员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学习情况。有关业务学习方面，主要是不定期地约请校外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前去讲演，著名作家老舍、叶圣陶先生都来这里讲过文章写作和语法修辞方面的问题。转过年来，整风学习开始、特别是在转入反对右派斗争以后，约请学术界人士来校讲演的工作停止下来。教研室的同志一面继续编写教材，一面按照校委会的统一部署，还以较多的时间参加反右派运动。

8月下旬，我在新学年开学前夕到党校报到。这时，新闻教研室编写中国报刊史的工作早已开始，全书各个章节多已分别写出初稿，具体编写的事自己插不上手，只是参与对已编写出来的各章的讨论。车道沟的校园靠近紫竹院（那时住地周围建筑物还很少，紫竹院公园还是一片荒凉），环境幽静，党校图书馆的存书又多，是一个理想的读书、研究学问的场所。因为报刊史的编写工作插不上

手,自己一边利用难得的时机读书,同时着手对我国报刊史影响较大、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一些研究,考虑列入计划的题目,是邹韬奋和《生活》系统的报刊、张季鸾和《大公报》。

邹韬奋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真理、寻求光明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是我国报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他所主编的《生活》周刊及其以后创办的许多报刊,30年代曾经在我国知识界和青年一代中产生过巨大影响,引导大批知识青年走向革命斗争的道路。当时比较关心政治的知识青年,有很多人受过韬奋著作和他所办事业的影响。在近代中国的新闻记者和作家中,很少有人像他拥有那么众多的读者,在群众中产生过那么广泛而深刻的教育作用。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青年一样,笔者在学生时代也曾在思想上受到韬奋的启蒙。在自己从事新闻工作以后,深感韬奋作为一个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所表现的伟大事业精神,独创的新闻实践经验和他基于人民立场的办报观点,都是值得新闻工作者学习的。

《邹韬奋》的写作比较顺利,一来是对他的著作和经历比较熟悉,先前断断续续地作过一些研究,而且围绕《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书,还曾发表过几篇评述韬奋著作的短文;同时在写作中得到各方面人们的热情帮助。笔者先后访问过20多位韬奋的家属、亲友和在生活书店工作过的同志,得到不少珍贵的资料。当时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工作的韬奋的弟弟邹问轩同志,曾从江西余江他们家乡找来韬奋幼年读书时的课本、笔记等资料。此外还有100多位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和同志,直接或间接地对这本书的写作给予帮助。他们或者代购参考书刊,或者供给所收藏的资料,有的不辞辛劳的代拍照片,有的详细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当时手上汇集保存有关这本书的来信有近200封(可惜这些热情洋溢的信件在“十年浩劫”中全部被毁)。这样,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在1957年7月初写成了传记《邹韬奋》初稿,并于1958年10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张季鸾和吴鼎昌、胡政之等人主持的《大公报》，是一张在旧中国出版的历史比较长久的报纸，在上层社会特别在知识界有过相当广泛的影响。这张报纸“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实，借人民之名掩权贵之实”，非常有效地为国民党当局服务而又蒙蔽了许多读者，是中国新闻史上一种奇特现象。它一直奉行拥蒋反共、亲美反苏的政策，采取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对共产党针锋相对的方针，表面上却挂起“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所谓“四不主义”的招牌，以“超党派”相标榜，装做第三者的“公正”态度，采取十分高明的手法和非常巧妙的编排技术，显示它与国民党嫡系各派不同的面貌。这张报纸对国民党政府所以采取“小骂大帮忙”的态度：要小骂，才能取信于人，才能在关键时刻帮大忙。因此，它虽经常为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帮凶，有时也反映人民的某些利益，部分地保持某些开明的色彩，以便吸引读者和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由此曾经迷惑了一些人，对读者有很大的欺骗作用。对《大公报》和张季鸾，也是自己久拟研究的问题。当时了解，只是北京大公报馆收藏有全份的《大公报》，曾听王芸生说过，有意将另一份不够完整的旧《大公报》合订本赠送给党校新闻班，但是并未成为事实。该报若从1902年创刊时算起，先后出版历时近50年；若从1926年9月1日张季鸾和吴鼎昌、胡政之接办续刊算起，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于6月17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也有23年之久。其间除该报天津版外，并曾出版有上海、武汉、重庆、桂林以及香港版等，翻查报纸的工作量浩大。

对《大公报》的研究方在着手，由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6月开始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右派运动。当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因为篡改报纸的政治方向，发表“党天下”而成了新闻界的热门人物，加以我同这个报纸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时又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储安平及其所主办的旧《观察》周刊。

（三） 储安平把报纸引向邪路

储安平 1957 年 4 月 1 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就在 1956 年笔者进出这家报纸前后，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根据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开始协助民主党派酝酿新任总编辑的人选。经过和各民主党派协商并征得本人的同意，最后确定为储安平。这年 11 月间，储安平在青岛收到章伯钧的信，内称经“各民主党派公推”，请他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促他早日回京。储安平当时没有回京，先在青岛、上海进行活动。他的亲朋好友，奔走相告，将储安平的新职看作自由派的一大胜利。在他到职半年以前，就有他的知友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所编刊物寄给“光明日报储安平总编辑收”。当时报社职工尚未风闻此事，总编辑还不姓储，结果理所当然地被退回了。

储安平到职不久，4 月 19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明确光明日报完全由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来办，并撤销中共党组、撤出原任党员总编辑、副总编辑。储安平从此开始实际掌握编辑业务。过去很少到报社来的章伯钧也特别积极起来。在储安平到职后的两个月内，比过去 8 年来报社的次数还多。其间章、储往还密切，共同谋划光明日报“新的方针”，却把报社最高领导管理机构社务委员会完全撇开，从储安平就职迄辞职间，没有召开过一次社务会议。章伯钧曾向储安平提出：本报过去带头横排，现在可以带头直排，对文字改革唱反调；要求多报道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活动，实质上是要替他本人作宣传；主张刊登西方通讯社发布的新闻，多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活动，等等。

储安平这时踌躇满志，出手不凡。他不单全盘接受章伯钧的意见，还有许多独创的新招，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不赞成运用报纸指导工作，认为解放区报纸的一套做法已经过时，现在要向